

书评：《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 生活在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的生活史]

兰 信三，上智大学

张岚《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 生活在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的生活史]，青弓社，2011年，316页，ISBN978-4787233295

二战时期，大约有155万日本人居住在伪满洲国。其中的绝大多数随着日本战败而回到了日本。然而，约有1万5千名日本人在总撤退之后仍然留在中国。在日本战败前后的混乱时期，他们历经种种成为了中国人的养子或妻子。前者称为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后者称为中国残留日本妇人。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残留孤儿中，九成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回到日本的。

中国残留孤儿经历了数次“越境”：从伪满洲国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的中国到高度成长后的日本。八十年代开始，残留孤儿在大众媒体和小说、电影中登场，在人文社会科学等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关注。在日本，中国残留孤儿被媒体塑造成“被战争拆散的家庭”“战争孤儿”等悲剧形象，研究则主要关注他们回到日本的过程、回国后的适应过程、日本社会的接纳和排外等状况。而中国则积累了大量关于残留孤儿的前半生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养父母的研究、关于残留经过的研究、以及关于当地社会人道主义举措的研究。中日双方各自把本国作为研究重心，研究往往欠缺另外一种视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岚却轻而易举地克服了这种倾向。

张岚在日本学习，日语能力在日本研究者中也是出类拔萃。除此之外，她没有囿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她感受口述的“小”故事，感受口述中的多声性和矛盾的能力却十分突出。张岚认真研读了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并自如地运用中日两种语言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调查，克服了先行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当时，“对话式结构主义”在日本逐渐确立。张岚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直接跟随其提出者樱井厚进行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推进自己的研究。

樱井厚提出的这种方法，是以口述者的一生为对象，通过与口述者的

兰信三，书评《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三世代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 生活在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的生活史]，” *Oral History Forum d'histoire orale* 37 (2017), Special Issue on Generations and Memo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对话”，积极地听取对方的生活世界¹，逼近其极细微的生活世界。张岚有效运用了这种方法的精髓。对残留孤儿和他们身边的人来说，中国文化才是原点，因此张岚用他们的母语——中文进行采访。另外，张岚还用日语对日本的志愿者团体和行政人员进行多次采访。前人因语言问题等未能顺利进行的双方采访，张岚成功地完成了。并且，张岚还实现了对在中日两国生活过（或正在中日两国生活）的残留孤儿、在日本生活的残留孤儿第二代、中国养父母这三代人的采访。张岚的田野调查以采访为中心，平衡地把跨越中日两国构成的残留孤儿的生活世界作为对象，先行研究的方法中潜在的问题——研究对象偏向某一方、甚至是十分容易陷入的民族主义问题，张岚也成功克服了。

张岚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养父母、残留孤儿、残留孤儿的子女这三代人的生活史的采访，详细地勾勒出多种多样有关残留孤儿的经验和思考。例如这四种情况：(a) 回到日本艰辛地生活的残留孤儿 (b) 选择在中国生活的残留孤儿 (c) 少数没有能够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 (d) 残留孤儿第二代。书中勾勒了涉及这两代人的种种“越境”的经验以及他们之间的不同所导致的多样自我认知的章节十分引人思考。

一直以来的研究都用 (a) 代表了残留孤儿，从历史性出发，建构了在中日两国的夹缝间经历了自我认同危机这样的“模版故事”。与此相对，张岚展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两义的自我”“灵活自我”“稳定的自我”这样多样、复数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张岚明确了这种多样性：尽管保有自己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因为被日本社会排斥而不得不建构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先行研究中的“两义自我”——在此之上，还有在相互行为中肯定地把自我既作为日本人也作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灵活自我”，以及表现出作为中国人的坚定的自我认同这样“稳定的自我”。此外，关于 (d) 残留孤儿二代的自我认同，不仅仅是“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国人”这样否定的自我认同，张岚还描绘出了“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这样肯定的自我认同。

张岚并不是对口述的内容作出解释，而是充分利用了樱井厚的手法所独有的“通过口述说出来”这一特点，进行了认真谨慎的采访。一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故事强调被中日两个祖国撕裂的人生和在两国的夹缝中动摇的自我认同的悲剧性，与此相对，张岚描绘出另外一个积极的、肯定的

1 樱井厚《インタビューの社会学》[采访的社会学]，せりか书房，2007，pp.28-31.

兰信三，书评《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三代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 生活在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的生活史]，“*Oral History Forum d'histoire orale* 37 (2017), Special Issue on Generations and Memo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自我认同，揭示了中国残留孤儿多样的、肯定的生活方式。这是只有张岚才能做成的采访和田野调查的成果，可以说张岚为中国残留孤儿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一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故事是这样形成的：或是日本研究者对于殖民统治和抗日战争的反省和某种赎罪，或是中国研究者以“伪满”这种中国的历史观，特写了负面的自我认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采访的主题与历史认识问题、民族主义、诉讼等密切相关时，用怎样的语言——即“口述之场”、在怎样的状况下进行采访的——“审判的状况及其相关的舆论动向、两国的民族主义状况等社会文化语境”，换言之，采访容易被“口述的磁场”强势地限制，采访者和口述者想要从中脱身并不容易。然而张岚却能了解双方的解释的背景，并采取与其不同的位置性，听取这样灵活的肯定的自我认同的口述，得到了残留孤儿自我认同的复数性这样的成果。我认为，这是用两种语言采访并且超脱于国家的历史观和民族主义，比较自由地考察所得到的。

本书揭示了残留孤儿的“自我认同的复数性”，这得益于张岚明朗积极的性格、熟练运用中日两种语言的能力和她绝妙的位置性。本书不但展现了中国残留孤儿新的一面，还成为了一个范例，展示了在如此困难的研究课题下生活史采访的理想状态。